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

ZHONGGUO XINWEN CHUANBOXUE YANJIU ZUIXIN BAOGAO

最新报告 (2008)

童 兵 /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成果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

ZHONGGUO XINWEN CHUANBOXUE YANJIU ZUIXIN BAOGAO

最新报告

(2008)

童 兵 / 主 编
陈月明 / 副主编
陈 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08) / 童兵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7-309-06241-0

I. 中… II. 童… III. 新闻学: 传播学-研究报告-中国-2008 IV. 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6899 号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08)

童兵 主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姜 华

出品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890 × 1240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458 千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9-06241-0 / G · 781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08)》是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简称985基地)成立后组织编写的第三本年度报告。我们编写这本年度报告的宗旨,是鸟瞰式地向人们展示过去一年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科科学研究的全貌,包括研究领域及代表性学术观点,研究热点和亮点,学术会议概况和公开出版的新闻传播学类专著与教材。

读者们读完这份研究报告可以发现,2007年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有三个亮点:一是由于一些学科基本概念的重新讨论引发对整个学科体系的关注;二是由于对以往研究方法的检讨引发对过去结论的反思;三是由于一些新法规的出台引发同这些新法规相应的新闻现象的思考。这些亮点把新闻传播学的基础性研究推向深入,从而从总体上提升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水准,同时又鲜明地凸显新闻传播学应用层面的特色。

经过10多年的持续努力,媒介素养研究已经从一个热点问题逐渐深化成具体的研究课题,成为重要的教育理念,并开始走向社会实践。

对于外国新闻媒介改版的观察,关于美国普利策新闻奖重视负面报道的思考,为中国的媒介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对融合新闻、民生新闻、付费采访等新闻实务议题的研究有较大的深化。

中国用近30年时间走完推介、引进西方传播学的路程。学者们着手对这一路程和引进的传播学原理进行学术反思,标志着中国的传播学建设开始迈上自主创新研究的新阶段。一些学者对传播学研究新方法新视野的开拓,预示着这一学科将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至于过去一年科学研究工作的不足,我们以为主要是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缺少中长期规划和明确的课题指南引领,缺少重要的标志性学术成果,应该引起学界和主管部门重视,并切实有所改进。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和部分博士后研究人员协助主编收集和整理本报告所需要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撰写了初步的研究报告,陈月明教授和陈杰博士研究生协助主编对这些资料及初稿进行了整理和编辑。张晓峰副教授提供学术会议和著作教材出版的资料。教育部社科委委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丁淦林教授阅读本报告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作为本研究报告的主编,我要向丁淦林教授表达深深的敬意和谢忱,并向参与本报告的作者团队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刻苦钻研的学风和协作攻关的团队精神表达我衷心的感谢。

童兵

2008年端午节于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目 录

前 言	童 兵 1
-----------	-------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报告(2008)	2
---------------------------	---

第二部分 新闻学研究

新闻理论研究	20
新闻史研究	36
外国新闻媒介研究	43
新闻实务研究	55
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研究	71
新闻传播法规研究	83
新闻伦理与职业道德研究	90
舆论监督研究	99
新闻教育研究	114

第三部分 传播学研究

传播学理论研究	124
媒介理论研究	134
受众研究	142
媒介素养研究	149
广告研究	155
公共关系研究	167
网络传播研究	177
新媒体研究	189
媒介文化研究	199

第四部分 广播电视研究

广播及节目研究	212
电视及节目研究	218
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研究	231

第五部分 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

传媒经济学研究	242
传媒经营与管理研究	247
新闻传媒体制改革研究	255

第六部分 编辑与出版研究

编辑理论与实务研究	264
出版理论与实务研究	272
出版产业研究	282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报告(2008)

2007年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有三个亮点:一是由于一些学科基本概念的重新讨论引发对整个学科体系及学科地位的关注与争议;二是由于对以往研究方法的检讨引发对过去结论和评价的反思;三是由于一些新法规的出台引发同这些新法规相应的新闻现象作理论上的观察与思考。这些亮点把新闻传播学的基础性研究推向深入,从而从总体上提升学科建设的水准和学术研究的水准,同时又鲜明地凸显新闻传播学应用层面的一些特点。

2007年的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报告拟从新闻学、传播学等方面分别进行扫描与分析。在新闻学研究视域中,突发事件新闻报道、新闻传播法规、舆论监督三个方面有较大的深入。在传播学研究视域中,媒介理论、媒介素养、新媒体和媒介文化等方面有较多的新内容。在广播电视研究视域中,广播和电视的节目形态方面较有新意。在媒介经济与管理研究视域,传媒体制改革研究备受关注。编辑与出版研究是2007年较集中的一个研究视域,这个学科的新进展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2007年高校新闻传播学继续召开一系列有学术水准的会议。同海外学者合作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学术年会逐渐成为品牌,学术交流向纵深推进,是这一年学术会议的特点。2007年新闻传播学学术书籍的出版数目众多、种类丰富,学术含量有所增加,折射出高校新闻传播学界同业界并肩而行的特点。

2007年11月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科4个985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和4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第二届主任联席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和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省级重点研究基地主任也与会。会议商讨学术研究和协调事宜。这种组织形式和议事方式为其他学科所没有。会议决定委托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在2008年适当时机举办以中国新闻改革30周年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他基地共同发起。会议还决定第三届基地主任联席会议于2008年下半年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由广播电视研究中心负责筹办。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新亮点

2007年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亮点突出,使得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论文数量多,学术会议不断,而且学术水平总体上有所提升。

1. 学科体系构建中重要概念的重提与共识

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新闻学理论体系构建尚存争议,有关学科基本概念的探讨始终是高校研究者关注的课题。在2007年中,关于新闻真实性、客观性、宣传、新闻自由等过去反复争议过的概念再次提出并引起学界热议,是以往不多见的。

展开新闻真实性讨论的直接导火索是北京电视台播出“纸馅包子”虚假报道。对这一事件的谴责后来扩展为对生态环境、传播机制、新闻观念、新闻公信力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的广泛讨论,并进而延伸到对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宏观真实与微观真实的重新解读。甚至有学者指出,新闻真实对于建立民主社会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新闻真实是实现民主的基本保障,是信息社会的安全前提。

与真实性相关的另一个新闻学基本概念是客观性。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把“客观性”这一概念

直接导入新闻专业主义层面来阐述,认同西方新闻界对客观性的解读,即主张事实与价值分开,坚持真实、客观等原则。

2007年的新闻史研究集中对以往的史学研究进行反思,认为新闻史研究中本体意识的缺失,不能正确把握新闻史与政治思想斗争史的关系,结果使新闻史成了政治思想史,因此,强调和突出本体意识就是要求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学者们主张,今后的新闻史研究应该突破范式,调整框架,转换视角。

关于传播学的定位以及它与新闻学的关系研究,在2007年有新的进展。学者们对我国传播学研究总体上呈现“一般化”、“西方化”的倾向提出批评,指出在众多的传播学成果中,真正属于我国传播学者独自研究心得和原创成果的较少,其中能够结合我国国情,运用传播学的原理和方法,解决我国新闻传播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更少。他们主张,传播学研究的学术定位应该立足于我国国情,从满足传媒业发展以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来开展学术研究。以此为定位,就要在中国传播学的“个性化”、“本土化”上下工夫,并且处理好同新闻学的学科关系,彼此借鉴,共同繁荣。

在过去一年中,学者们比较理性地对待外国传播学研究及其成果。有学者对西方传播学界认定的四大奠基人的认定标准提出质疑,认为过去的认定标准受“二战”前后的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控制等因素的引导,这使得某些学者观察和评价传播学奠基者时,把成果卓越的芝加哥派的学者抛在了一边,并进而设定了传播学研究的藩篱,对这门新兴学科的全面发 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有研究者指出,如果从芝加哥学派的人文、社会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的传播活动,传播学研究就有可能走出“五W”模式的狭窄天地,展开更为宏观的研究领域。

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对这些重要概念、重要原理以及重要史实的重提与反思,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2. 对突发事件的关注和相应法规的解读

2007年有多起突发事件发生,太湖蓝藻事件、河南淹井事件、凤凰塌桥事件……面对这些众多突发事件,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跟踪研究。通过对太湖蓝藻事件的分析人们得出结论:坚持透明报道,满足受众“兼听则明”的需求;对河南淹井事件的报道研究,人们提出,要集中报道,抢占舆论先机;在湘西凤凰塌桥事件的研究中,人们提出对事件真相和事故原因记者有责任追问。

在对突发事件进行表层扫描之后,研究者围绕这类事件中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层的讨论,认为这类事件涉及风险社会、公共管理等领域的许多问题。2007年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呈现了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是围绕政府、媒体、公众三大主体展开。对政府而言,要加强危机管理和舆论引导;对媒体而言,要注意强化责任意识,同时注意维持公众利益与媒体利益间的平衡;对公众而言,是提升危机认知能力,同时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满足。第二是借助“传播流”、“新闻专业主义”、“组织传播”等多个理论概念,采用问卷调查、文献分析、历史研究等多种方法对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进行全面研究,成果颇多。

在2007年中,由于频频发生的突发事件牵动人们的心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相继出台也使“透明政府”、“信息公开”、“媒体责任”再度成为新闻学术界使用率不断提升的关键词。对这两个新法规的解读成为这一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点。研究者敏

锐地观察到《突发事件应对法》二审稿删除了有关新闻媒介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的条款,认为这可视作政治理念新走向的象征,它传达出在行政机构对信息控制权与信息公开原则的权衡中,最高立法机构最终倾向对“信息公开”原则的捍卫。“信息公开”原则在国家理念中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最高立法层面的肯定。学者们在研究中梳理了信息公开原则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认为删除后的二审稿体现出政府从“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同时赋予传媒对突发事件及时报道的权利,使人民的知情权得到制度上的保证。也有学者指出,二审稿中的“统一发布”一词日后很容易成为对事故负有责任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封闭不利消息、掩饰错误、逃避责任的借口,还须进一步修订。

3. 媒介素养研究从教育理念走向社会实践

经过 10 多年的持续努力,媒介素养已经从一个热点问题逐渐深化成具体的研究课题,成为明确的教育理念,并开始走向社会实践。

高校学者在以往几年的研究工作中对于媒介素养的内涵和外延已有明确界定,2007 年的研究大致围绕媒介、文化、教育三个视角展开。媒介的变化和发展是开展公众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公民媒介素养水平的外部原因。媒介素养必须置于整个文化发展的脉络中去考察和掌握。有研究者指出,以文化反哺为代表的关于文化传递的理论,是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由完全的保护主义转向相对的保护主义的思想基础。但是,这种文化反哺理论对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影响仍很微弱,因此中国目前的媒介素养教育主要价值走向仍然是沿袭西方早期媒介素养教育的保护主义价值取向。作者认为,中国媒介素养教育未来的价值走向必然是尊重多元文化,实现由绝对保护主义向相对保护主义的转变^①。

媒介素养的理论研究最终为了给教育实践提供依据和参考。有研究者为学校媒介素养教育设计的目标体系为:以认识媒介为主的知识目标,以运用媒介为主的过程目标和以批评媒介为主的价值观目标。而评价体系则可分为国家测试评价、学校和教师评价、学生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②。

有多位学者指出,媒介素养研究积 10 年之功之后,现在需要有一个认真的反思。他们指出,目前的研究工作大多停留在媒介素养的战术研究层面,即从媒介素养自身出发来研究媒介素养,缺乏从国家宏观政治、经济、政策机制、社会环境等战略高度的背景来看问题。从历时性看,媒介素养研究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具有厚积薄发性和后续递延性;从共时性看,媒介素养研究始终处于人、传媒、环境的互动之中。系统的媒介素养研究应该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的并重。

二、新闻学研究

2007 年新闻学研究围绕新闻理论、新闻史、外国新闻媒介、新闻实务、突发事件新闻报道、新闻传播法规、新闻伦理与职业道德、舆论监督、新闻教育等九个方面展开。结合这一年的诸多新闻事件和学界感兴趣的话题,许多论文发表了有新意的学术见解。

1.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工程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工程建设在 2007 年有所进展。《新闻学概论》初稿已经过两次讨论,等待定稿。《新闻采访与写作》正在撰写。《中国新闻传播史》已经过教育部专家组评审,正待最后批准。

^① 参见仇加勉:《超越保护主义:文化反哺视角的媒介素养教育》,《现代传播》2007 年第 4 期。

^② 参见田丽君、陈莉娟:《学校媒介素养教育目标体系及实施策略探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 年第 8 期。

2. 新闻理论研究

这一年围绕新闻学基本概念的探讨,发表了不少论文。学者们结合近年学界与业界争议的问题,就宣传、真实性、客观性等发表了有意义的观点和主张。有学者指出,今天对宣传的重新界定,将使人们重新注意通俗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思考民主、自由所面临的挑战。

由2007年一系列假新闻所引发的真实性讨论,除了讨论有关学理问题外,还深入到社会深层原因和传媒体制进行剖析。有学者指出,新闻真实是实现民主的基本保障,是信息社会的安全前提。对于新闻传媒来说,如果社会提供了信息公开的环境,对新闻自由提供足够保障,那么社会公众能否拥有一个安全的信息环境,关键要看新闻传媒能否发挥其传播功能,真实、客观、全面、公正、及时、公开报道有关信息^①。还有学者指出,必须解决传播把关人缺位问题,要有一套完备的操作机制作保障,尤其要建立把关过程中的防控机制和追究机制。也有学者认为,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如果传媒单位的用工制度不规范,考核办法不合理,仍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即使处理力度再大,也难保不出假新闻^②。

新闻专业主义的相关论述其实和新闻真实性、客观性在逻辑上是结合在一起的。有学者梳理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产生历程及其“公共服务”的信念,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加强了新闻从业者对自我职业形象——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心理需求。也有学者指出,在西方新闻业追求新闻专业自治目标的过程中,新闻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经营构成了西方新闻专业化的经济基础,服务公众和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下的新闻自由成为新闻专业化的理念基础,而大众社会的兴起成为新闻专业化合法化的社会基础,因此,“新闻专业化的争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过程,新闻专业主义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社会、历史环境变化中多方博弈者力量的消长”^③。

由于2007年相继发生重庆“钉子户”事件和杨丽娟事件,新闻媒介的越位再次引起广泛关注,有关媒介批评的研究也较集中。对于重庆“钉子户”事件,有研究者认为,传媒机构通过议程设置对现实环境中发生的客观事实,进行选择、加工、重构而成的“拟态环境”,同客观事实已经全然不同。这种不同的重要原因在于新闻报道的“事实”中已经自觉不自觉、或明或隐地渗入了记者、编辑或传媒机构的主观意识和思想倾向^④。在对重庆“钉子户”事件和杨丽娟事件中传媒越位进行批评的过程中,研究者对于传媒消费主义以及商业化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在媒介批评的诸多研究中,“社会责任”成为热门话语。同媒介的社会责任密切相关的则是媒介公信力。研究者指出,中国公众认为电视新闻最可信,传统媒介的新闻比网络新闻更可信。而要真正维护媒体公信力,须对目前的媒介体制进行变革,让媒体对自己的公信力真正负起责任^⑤。

3. 新闻史研究

2007年的新闻史研究较往年引人注目,不少学人对过去的新闻史研究方法进行反思与批判,构成

① 参见杨保军:《新闻真实:民主社会信息安全的内在要求》,《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

② 参见屈志坚:《从假新闻的出笼看把关人缺位》,《传媒观察》2007年第9期。金曙:《从“假包子事件”试看“新闻民工”的生存状态》,《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9期。

③ 参见孙利军:《西方新闻自由语境中的“新闻专业主义”》,《当代传播》2007年第2期。王学成:《“现实”与“理念”下的分裂——重思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1期。

④ 参见赵中颖:《“杨家坪拆迁事件”的传媒反思》,《新闻记者》2007年第5期。

⑤ 参见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解析中国媒介新闻可信度》,《新闻大学》2007年第4期。刘有才:《新闻媒体公信力的流失与对策》,《传媒观察》2007年第8期。

本年度的研究重心。同时,个案史、专题史、新闻界人物和具体的史实考订工作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这一年,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新闻大学》编辑部组织了新闻史专家笔谈,将他们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的思考刊发于《新闻大学》上,在新闻史学界掀起了一阵热潮,同时也构成了本年度新闻史研究的热点,表达了学者们对新闻史研究的自省和期待。

首先是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缺失。有学者指出,造成本体意识难以把握的主要原因是新闻史本身与政治思想斗争史关系密切,结果是新闻史成了政治思想史,具体表现为:只讲宣传内容,忽略报刊是在怎样的宣传方针指导下运用宣传技术和策略的,而后者恰恰是新闻史应涉及的主要内容。学者们认为,强调本体意识就是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各样的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具体到报刊史而言,就是要分清“历史的报刊”与“报刊的历史”。“历史的报刊”,就是通过研究报刊去研究某一方面的历史;“报刊的历史”,则是研究报刊本身的发展规律,新闻史的任务就是研究报刊的历史。新闻史研究的中心应是媒介自身^①。

在新闻史研究中实现范式突破,框架调整,视角转换是学者们的共识。有学者根据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研究范式理论,提出中国新闻史研究“两范式”观点。另一位学者进一步将其细化,认为戈公振和他的《中国报学史》代表了流行于20世纪20—40年代的一种范式,可称之为体制与媒介经营范式。这种范式以“报史是报纸自身发达的历史”为新闻史观,以报纸为研究对象,以媒介经营为关注重点。1956年大纲草稿和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代表又一种范式,盛行于20世纪50—70年代,称为政治与媒介功能模式,20世纪50年代受到苏共报刊史的影响而形成,影响至今,50年代以后大陆的新闻通史著作都可归于此一范式之列。还有学者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当借鉴“新史学”路径,探求一种“新新闻史”的写法,以社会史的范式及将新闻传播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有机环节,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更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将新闻与社会、理论与历史融合,采用叙事学的方法,增强新闻史中的叙事成分,突出新闻史中鲜活的人物、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作品^②。也有学者建议将新闻传播史解构为三个子系统,即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并建立三者彼此交融统一的三维历史空间^③。

4. 外国新闻媒介研究

在2007年高校新闻传播学者对外国新闻媒介研究呈现浓厚的兴趣。仅从学术期刊和新闻业务期刊上就检索到近200篇论文。

对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美国公民新闻运动,有研究者指出,“公民新闻”是美国社会发展和大众传媒发展的结果,它表现了美国新闻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媒介社会责任新的思考^④。

研究者对外国报纸的改版给予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坚守了117年版式保守的独特风格后,在2007年实行改版。这一年,另一张美国大报《华盛顿邮报》也推出全新的“艺术时尚”版。《纽约时报》在这一年显得更苗条了,报纸的宽幅缩减了3.81厘米后变为30.48厘米。研究者从《编辑与发行人》2006年度报告发现,美国星期天报纸总发行量从1995年到2005年下跌了9.7个百分点。在这种

① 参见方汉奇:《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与方汉奇教授谈新闻史研究》,《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② 参见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③ 参见张昆:《新闻传播史体系的三维空间》,《新闻大学》2007年第2期。

④ 参见邵培仁、李一峰:《论美国公共新闻运动》,《嘉兴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

情况下,创新经营方式,变革内容和形式,显然是一条走出困境的出路。

在对第90届普利策新闻奖为范本的新闻文体研究中,研究者发现14项大奖中有11项属纯粹的负面新闻,占获奖总数的78.6%。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讨邪伐恶是美国现代报业的一个重要职责。虽然资产阶级报纸把揭丑新闻客观上当作吸引读者的手段,但这一种揭露与批评有利于打击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的官僚资本家,对社会进步产生积极的作用,能够起到维护现行制度的作用^①。不仅负面报道引起研究者关注,普利策新闻奖的人物报道的价值选择也令人们感兴趣。研究者将普利策新闻奖人物报道所青睐的对象概括为:自然灾害、社会大变动之后的普通人生活;与疾病及生理缺陷抗争的普通人;与种族、贫困等社会问题相关的人;道德上存在争议的普通人;犯罪活动中的受害者。在主题选择上,与自然灾害、战争、社会大变动紧密相关。在表现手法上,充分展示出西方形象思维的多元性。新闻人物性格鲜明,形象丰富。注重写实,生活真实感强^②。

5. 新闻实务研究

从总体上看,2007年的新闻实务研究,延续了前几年的一些热点话题,比如党报改革、融合新闻、民生新闻、博客新闻、付费采访等。这一年新闻实务研究先天所具有的贴近实际、目标明确、导向作用强的特点,在2007年显示得淋漓尽致。

有学者指出,新闻来源的保护是各国新闻界都难以彻底解决的问题。新闻工作者从伦理角度出发对新闻来源的匿名保护,在面对法律时往往沦为空谈,而新闻实践中泛滥的匿名策略也会对新闻本身造成伤害^③。还有学者指出,正确使用新闻来源是提升媒体公信力的基本要求。媒体不仅要提供最新的新闻事实,而且最新的新闻事实是由最权威、最可信的新闻来源所提供的。

2007年新闻策划关注的重点是新闻策划应把握的尺度,新闻策划与新闻炒作、假新闻的界定。有研究者认为,新闻策划的主旨在通过策划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客观上要求报道者注意资源开发的适度。目前,这种开发的不适度,主要表现为不足与过度两个方面。其中,不足表现为有些新闻报道脱离新闻事实孤立存在,一些内容重复的一窝蜂式的报道时有可见,使得新闻资源难以展示其内在价值;而过度的开发,又形成超越现实的需要,甚至违背新闻传播的原则,造成对新闻资源的滥用^④。

有研究者指出,在新闻策划实施过程中,必须把握好两个方面的“度”:一是宣传要适度,不能炒作过头,产生副作用;二是投入的代价要适度,也就是说,策划带来的实际效益必须大于实际投入^⑤。还有研究者强调,新闻策划是新闻传播的一种程序化的计划、组织、整合、实施的过程,它归根到底是一种传播形式的“策划”,任何对新闻事实的策划都会背离新闻真实性原则^⑥。

有学者结合记者“介入”新闻的问题,指出,记者的策划性介入并不等于说记者可以主观臆造“事件”。这与其说“新闻策划”,不如说媒介作秀^⑦。还有学者指出,新闻业内普遍存在的讲故事的热情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利于新闻信息更有效地传播,使受众更乐于接受新闻信息;另一方面,如果

① 参见朱清河:《从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的负面报道谈起》,《新闻战线》2007年第2期。

② 参见郑越:《美国媒体人物报道的新闻价值取向——以普利策新闻奖中的人物报道为例》,《新闻知识》2007年第6期。

③ 参见项亮:《媒体保护新闻来源的匿名策略分析》,《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④ 参见辛红:《“新闻传播策划”浅论》,《新闻知识》2007年第10期。

⑤ 参见张月环:《试论新闻策划的“度”》,《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⑥ 参见庄梦墨:《新闻策划与新闻的真实性原则》,《理论与当代》2007年第8期。

⑦ 参见徐国源:《记者如何“介入”新闻》,《新闻导刊》2007年第5期。

把握不当,也会影响记者对于新闻事实本身价值的判断和思考,有可能对新闻价值很少而故事性很强的内容大加报道,使受众沉醉于故事性而疏于理性的思考^①。

有研究者认为,如果说2005年是“中国博客大众化元年”的话,2007年则是博客新闻发展走向成熟的一年。博客新闻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对传统媒体的影响、管理机制和受众心理。而伴随着手机短信、博客、播客等个性化传播形态的蓬勃发展,一种新的称谓开始出现,那就是“公民记者”。厦门PX项目迁建是2007年重大新闻事件之一。在这个事件中,疯狂传播短信的那100万厦门人似乎正是“公民记者”^②。有学者认为,市民新闻(也称公民新闻或草根媒体)是一种崭新的新闻理念和操作实践,它不同于传统的以媒介社会责任理论为代表的新闻观,也不同于西方近些年兴起的公共新闻和民主参与理论的新闻观。市民新闻以博客为主流表现形式。市民新闻消解了传统媒体的“守门人”^③。也有研究者从“市民新闻”的发展现状与问题出发,指出中国的市民新闻还处于初级实验阶段,代表着新闻事业发展方向,还存在机制问题和“去农民化”倾向^④。

2007年对付费采访的研究,更多地把付费采访放到我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考察,研究主题则为付费采访的性质和界限,目的是规避其负面效应。有学者指出,社会转型是当下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付费采访现象是无法回避的价值冲突问题,在推动对个体劳动价值的尊重、促进民主建设、强化保护知识产权意识、提高记者新闻业务能力方面有积极意义,但也可能导致采访对象沽市谋利,影响公共利益,媒体垄断采访,降低新闻品质,采访行为异化,助长新闻腐败。还有研究者提出,付费采访应遵循一定的界限,即:公众人物披露公共信息不得收费;具有一般新闻价值的事件或人物接受采访不应收费;媒介不能采用付费方式垄断公共信息。

有研究者指出,“媒体融合”的特征表现为:多媒体信息在同一平台上的能量互补;各类媒体之间的信息能量交换;信息传播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信息能量交互;外部产业对传媒业的能量支持^⑤。又有研究者指出,“融合新闻”是对传统新闻传播范式的整合与重构,新闻传播主体由职业新闻工作者独家垄断转变为职业人员与社会公众共同分享,新闻信源也随之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第一,这种改变使得新闻传播效果具有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新闻媒介组织对新闻传播的控制也越来越难;第二,报网互动、台网互动,以及通过组织机制改革实现集团内部的资源共享、流程再造,能为区域内媒体打破传播的地域限制提供渠道和平台,直接带动媒介影响力的增强和经济效益的增加;第三,随着传播手段和方法的改变,对新闻传播内容整合加工的难度越来越大,如何对内容准确定位,对表现方式适当选择,对传播流程有效地进行控制与管理,成为所有新闻媒介面临的新问题;第四,根据融合新闻对新闻采编人员的要求,新闻传播教育需要加快改革步伐^⑥。

由于近年来党和政府对民生工作的重视,关于民生新闻的研究仍是2007年较集中的一个课题。这一年讨论较多的是民生新闻如何克服低俗化、庸俗化,提高质量和品位,确保民生新闻健康发展。有

① 参见丁柏铨、杨坚:《新闻传媒应从“杨丽娟事件”中反思什么?》,《新闻实践》2007年第5期。

② 参见蓝云:《“厦门PX”短信事件报道始末》,《南方传媒研究——数字报纸》(第9辑),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

③ 参见尹冠男、孔祥武:《市民新闻的兴起与媒介接近权的演进》,《青年记者》2007年第5期(下)。

④ 参见章羽、赵俊峰:《我国公民新闻的兴起现状与问题》,《西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⑤ 参见高钢:《媒体融合:追求信息传播理想境界的过程》,《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3期。

⑥ 参见蔡雯:《“融合新闻”:应用新闻学研究的新视野》,《淮海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蔡雯:《媒介融合带来新闻编辑部角色变化——从新闻采编到知识管理》,《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4期。

学者指出,新闻的世俗化和平民化追求,不能成为庸俗化和游戏化的挡箭牌^①。有学者强调民生新闻必须优化品质,指出:一个社会的发展不只是需要关注吃喝拉撒,千万不要只沉湎于日常的琐碎的鸡毛蒜皮之中,必须看一看远处,这才是媒体更重要的职责所在。有人指出,民生新闻虽然以百姓生活点滴为报道的基点,但同时应兼顾国家的大背景大环境,以此增加新闻的权威性和厚重感^②。

有学者对民生新闻重新解读,认为民生新闻是一种新的新闻传播范式,民生新闻的独特内涵主要包括:题材选择上的民生内容,报道立场上的平民视角,价值取向上的民本意识,报道方式上的民众话语。当前要处理好两个问题:其一是科学对待民生新闻与社会新闻的关系,尤其是科学看待民生新闻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其二是正确认识民生新闻传播范式与其他新闻传播范式的异同,特别是要弄清民生新闻与公共新闻的关系。如果着眼于本体性层面,可以发现民生新闻传播范式具有三方面的独特价值:一是开拓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空间,二是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创新路径,三是建构了一种富有中国文化底蕴的新闻理论^③。

三、传播学研究

2007年的传播学研究,围绕着传播学理论、媒介理论、受众、媒介素养、广告、公共关系、网络传播、新媒体、媒介文化等九部分展开,这里重点梳理前几部分的研究领域和代表性观点。

从研究领域和主题看,2007年基础传播学研究同上一年度一样,主要集中在传播学研究的新方法与新途径探讨、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反思和探索、传播学的定位与正名、外国传播学理论研究、跨文化传播等几个方面。

1. 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反思与开拓

中国用了近30年时间,即将走完引进、推介西方传播学的路程。从2006年开始,有几位学者着手对这一历程和一些引进的传播学原理进行反思,2007年继续进行这一工作。这些工作标志着中国的传播学建设开始迈上自主创新研究的新台阶。

有学者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批判性传播学派及其符号传播研究在中国兴起以来取得的成绩,认为在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传播符号学研究基本形成了两种取向:本体论取向和方法论取向。前者探究传播符号学自身的基本问题,后者则通过文本和内容分析对各种传播现象进行解析。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传播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总体上属于传播研究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具有社会学所谓中观理论的特征,从而有别于经验传播学的微观考究和批判传播学的宏观叙事,它与经验传播学和批判传播学鼎足而立,同时又互相渗透,彼此勾连^④。

有学者对我国目前传播学跨学科研究作了评估和分析,认为普遍存在着“研究泛化、浅层次化、实用化”倾向,冠以“某某传播学”的论著只是简单地在五个W框架下把传播学的概念与相关学科结合,有独到见解、有系统观点的学术成果不多。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反而冲淡了传播学本身的学术构架和理

① 参见时统宇:《努力提升民生新闻的质量和品位》,《现代传播》2007年第5期。

② 参见王立纲:《新闻民生化之忧》,《青年记者》2007年第6期(下)。柴素芬:《民生新闻该选些什么》,《青年记者》2007年第6期(下)。

③ 参见董天策:《民生新闻: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范式》,《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④ 参见李彬:《批判学派在中国:以传播符号学为例》,《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论话语。这位学者还认为,以本身的理论建构为主的跨学科传播学本源研究来说,传播学研究应该回归到与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相结合上来,以信息及其量的研究作为核心,与符号及其意义建构联系起来,把信息传播看作是利用各种符号传递意义的过程^①。

还有几位研究者在反思现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或建议。有的就我国传播学界“传播批判理论”术语使用混乱问题,讨论并界定三个基本概念:批判、批判理论和传播批判理论。他认为,传播批判理论与经验传播学研究之间的本质区别,既表现在传播批判理论所一贯倚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也表现在传播批判理论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重点上;传播批判理论重点研究的是传播的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更关心谁控制大众传播体制的问题,更多地从宏观层面来设问并构建其理论^②。有研究者提出“传播元理论视野下的传播理论框架”。他批评我国传播学界只注重“引进式介绍”和“引进式研究”,而忽略对传播学本体理论的探索。他主张建立以“人——媒介——社会”为基点的、由传播学核心理论和外延理论构成的传播理论框架^③。还有一位研究者指出,我国传播学著作中一方面普遍接受拉斯韦尔提出的五大研究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又将传播功能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这导致传播功能研究的地位、传播功能研究与五大课题框架关系模糊不清。他认为,传播功能研究的关键问题往往集中于探讨传播活动的社会效果,传播效果研究和各种理论也都包括一定的传播社会功能观。因此,功能与效果之间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如果把传播功能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联系起来,可以为传播功能研究找到准确的学科定位,也可以加深对传播效果理论的认识与理解^④。

2. 传播学的定位与命名

在2007年,许多学者就传播学在中国的学科定位与命名,发表了不少深刻的见解。有学者指出,尽管我国目前呈现出“传播学热”,但传播学研究总体上还停留在“一般化”和“西方化”的水平上。该学者主张,我国传播学的学术定位应该是:立足我国国情,从满足传媒业发展,以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来开展学术研究,为党和政府的执政决策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服务。以此为定位,传播学研究应该独立思考,多在中国传播学的理论“个性化”和“本土化”上下工夫^⑤。

一些学者就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学科领域和彼此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有学者在考察了传播学、新闻学院名称和涵盖范围的发展沿革过程后指出,传播学刚兴起时,被置于新闻学之中,使得新闻学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后来传播学发展,更多冠以“传播”的院系和刊物包含了新闻学的专业和内容,于是“传播学”概念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别。目前国内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领域之争,很大程度上是传播学“一词二意”引起的。该学者提出了“正名三措施”:第一,把整个学科命名为“传播学”;第二,把“狭义传播学”更名为“基础传播学”;第三,把“新闻学”(内含报刊新闻学、广电新闻学和网络新闻学等等)、“基础传播学”、“公共关系学”、“广告学”等明列为“传播学”的子学科^⑥。也有学者认为这两个学科定义有别,根源有异,有着不同的学科特质,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互补性。新闻学属人文学科,需要

① 参见严功军:《中国传播学跨学科研究的反思》,《新闻界》2007年第4期。

② 参见杨华:《传播批判理论研究三题》,《新闻界》2007年第5期。

③ 参见吴毅斐、庄术梅:《传播元理论视野下的传播理论框架》,《青年记者》2007年第2—3期。

④ 参见高海波:《传播功能研究新论》,《新闻界》2007年第2期。

⑤ 参见郑保卫:《浅谈传播学的学术定位与学科发展——一个新闻学者的传播学观察》,《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9期。

⑥ 参见赵心树:《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汲取传播学的学术精髓;传播学属社会学科,也需要汲取新闻学的人文关怀。两者的关系应该是“相互促进”、共谋“和谐发展”^①。

3. 传播学研究的新方法新视野

传播学本来就融合了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何突破传统的所谓传播学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研究范式,从其他学科挖掘传播学的理论资源,探索传播学研究的新途径新方法,这是2007年又一个投注力量的课题。

一些学者尝试从社会学的角度探索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新方法。有研究者从社会传播网络分析来拓展传播学研究。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接收或发布信息的活动,并非呈现单一的线性传播方式,而是一种多通路复合的网状模式。人们可能同时使用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方式,甚至大众传播方式。因此,传播学可借用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把个体的受众看作社会网络中的一个点,研究社会系统中传播机制、传播网络以及个体的信息接受方式,从而把握一个社会或社区的信息传播机制,以及不同个体或社团在特定传播网络的地位和影响^②。也有学者提出了社会转型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将“社会转型传播学”看作是“发展传播学”理论的拓展和延伸。发展传播学与发展社会学相呼应,而社会转型传播学与转型社会学相呼应,它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作为大众传播研究的基本逻辑起点,旨在建构包括技术、经济在内的,以社会文化发展为核心的社会转型传播理论。这样,就从以发展为核心的“技术、经济决定论”转向了以“媒介话语生产”为核心的“意义构建论”^③。

有学者主张借鉴现象学方法拓展传播学研究。沿着这一思路,传播学可以超越传统的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传播学研究方法,形成在方法论上独立于这两大传统方法之外的传播学研究方法——现象学方法。现在传播学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共同弊端表现在对于“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处理上。前者的思维向度是从个别到一般,关注个别,忽略一般。后者的思维向度是从一般到个别,关注一般,忽略个别。因此,经验学派的实证成果只能反映“片面的真理”和“局部的真实”,批判学派则以一般性前提或教条作为起点,将世界本身的丰富性和具体性统摄于若干抽象的概念之中。运用现象学方法及其“本质直观”思想可解决这两种学派无法妥善处理的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④。

有些学者认为可以从文化学或人类学的角度开拓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有人指出,文化人类学不仅同传播学存在着理论渊源,两者在关于“人”这一主体性研究方面也具有一致性,而且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在传播学研究上也有适应性和有效性。还有学者通过对埃德蒙·利奇的《文化与交流》的解读,阐述了人类传播行为与文化现象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揭示了人类学者对文化传播交流现象的探索及其研究过程的独特视野,认为这种文化学方法对传播学研究具有借鉴意义^⑤。

还有学者从施拉姆提出的“传播的研究将成为所有社会科学见面的基础”这一论断出发,阐述传

① 参见邓涛、强月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初探》,《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② 参见吴飞:《社会传播网络分析——传播学研究的新进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③ 参见姚君喜:《社会转型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当代传播》2007年第4期。

④ 参见范龙:《现象学——一种可资传播学借鉴的哲学方法》,《重庆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⑤ 参见连水兴:《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开启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学术研究》2007年第7期。胡河宁:《文化:理解人类传播行为的密码》,《人文杂志》2007年第3期。